

西方文化危机与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丁 云

(北京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24)

摘 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欧洲危机引起了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文化的严重危机感,促使具有宏阔世界眼光的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此过程中,他们的思想观念经历了急剧的变动,从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生存竞争、国家主义、财产私有到逐渐趋向于平民主义、互助进化、世界主义、财产公有,而集中辐辏于社会主义。从世界历史视野,用整体、统一的眼光看,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在世界文化变动催迫下引起的反响。

关键词:西方文化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选择

中图分类号: K26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16)01-0048-06

中国先进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一般的看法不外是:其外部原因是十月革命的影响;其内部原因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奠定阶级基础等等。这些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总的来说,关于外部原因,人们更多地强调十月革命的作用,而对当时整个世界环境条件的分析研究则不够深入。鸦片战争以来,以强敌为师,走资本主义道路,逐渐成为中国先进分子挽救民族危亡的共同选择。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总结教训,认为原因在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还不彻底。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仍然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为什么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就能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呢?这里可以换一个角度,从世界历史视野,用整体、统一的眼光,探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危机对中国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文化危机及其主要表现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强国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这场空前野蛮残酷的战争席卷了世界上的30多个国家,1千万人死于战场,2千万人受伤,多年的物质建设毁灭殆尽^[1]。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惨重破坏以及战后垄断资产阶级政

府之间的虎夺狼争,使西方世界沉浸在一片悲凉颓败之中。危机观念像一个庞大阴影,笼罩着整个西方社会,同时波及整个世界。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一书以及张君勱所做的《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演说在1920年前后风靡一时。不仅在《东方杂志》这类刊物上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种种现象的文章和报道,当时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蔡和森、周恩来等,对西方文化危机的事实也都有较系统的介绍和析述。只要把这些当事人的记述稍加省视,就可获得对这一危机及其在中国之影响的清晰印象。

(一)经济方面: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陷入衰颓、紊乱、濒临破产的境地

战前交战各国财富的总和为24 000亿金马克,大战的耗费为12 000亿金马克,恰好等于交战各国财富总和的一半。如此巨额消耗,到战后要继续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和社会经济生活,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增加公债,多征租税。各国国债大战后增加到1万亿金马克,约占各国财富总和的62%。战前各国流通纸币与各种信用券仅280亿金马克,战后陡增至2 800亿,涨了9倍。于是,金本位制完全变成了纸本位制,信用券、国库券及各种公债票和银行券充斥市场,币值摇动,经济恐慌^{[2]126}。正如梁启超所说:“欧洲各国自开战以来,公债比以前增加了几

收稿日期:2015-11-03

基金项目:北京市委教育工委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项课题项目资助(JGWXJCZX2014016)

作者简介:丁云(1970—),女,山东人,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百倍”“纸币发行日多”“汇兑日落一日,市面上硬币驱逐得无踪无影”“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老板,也一个个像我们一般叫起穷来,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资本及生产力差不多到了零度。”^[3]世界经济贸易严重失衡的现象,是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突出特征。由于债务的重负,滥发纸币,致使各国货币严重贬值,因而国际金融秩序紊乱。由于币值的不稳和大幅度跌落,中欧、东欧的农民渐渐恢复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甚至退回到原始的物物交换。美国在一战中大发横财,战后生产力水平开始雄居世界之首。但是,拥有先进生产力的美国,遇到的却是购买力低绌的欧洲,生产过剩的苦痛时刻缠绕着美国。有人比喻,欧洲当了美国的梯子,帮助美国上了屋顶,正当美国在屋顶上趾高气扬之时,梯子却已经折断了^{[2]128}。

(二)政治方面:劳工问题日趋高涨,国际争夺愈演愈烈

战后西方政治生活有2个显著特点:一是劳工问题日趋高涨,二是国际争夺愈演愈烈。劳工问题凸显,首先是由于纸币贬值,物价飞涨,生活贫困而引起的。其次,由于大战破坏了原来劳资之间一定的平衡关系。工人根据经验认识到:资本家靠战争发了横财,而一切战争费用和债务却要由工人来负担。再加上十月革命的影响,阶级的自觉心越来越强,这也是阶级冲突日趋高涨的重要原因。1919年各国罢工事件此伏彼起。英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在战前已有明显上升的趋势,“至休战后而大著。1919年1月至7月间,竟发生911次之争议,而关系的人数达179.4万人之多。8月以后,更形猛烈。”^[4]而1920年、1921年英国煤矿工人的大罢工,则几乎使英国全国经济活动陷于瘫痪。工人的罢工斗争不仅在国内引起剧烈震荡,在国际上也发生了重大影响。英国工人坚决反对政府武装干涉俄国就是很好例证。蔡和森亲眼所见的法国劳动运动更是如火如荼,九大行业联合要求产业国有,把政府吓得魂飞魄散。大战结束,虽然暂时解决了英、德两大集团间的胜负问题,但帝国主义分割世界的争夺却反而加剧了。英、法、美、日等国,围绕如何宰制德国、分割德国殖民地、进攻俄国、如何压迫几个半殖民地大国等问题,不仅在巴黎和会上暗斗明争,在和约订立之后,更是剑拔弩张。“各资本主义强国海陆军费的增加,超过战前的水平。英国军事预算增加三倍,美国增加三倍半。”沉重的军费负担,压倒战后疲敝的西方世界,其结果“人民的受苦比大战最昏黑的时候还要昏黑。”“欧洲现在已成了世界的病夫。”^[5]

(三)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战争和战后物质生活的枯竭使人心陷入虚幻、悲观、颓落之中,出现信仰危机

大战给西方人民的精神留下难以愈合的创痛:虚幻、悲观、颓落。战后物质生活的枯竭,和平理想的破灭,更加重了精神上的苦痛。社会的精神面貌是社会的物质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社会上一般人深感人事无常,信仰危机,精神恍惚。于是迷信鬼神、灵魂主义等风靡一时。仅在法国巴黎一城,从事算命行业的,多达3.5万人。伦敦操同业者“多至不可胜数。全城居民,趋之若鹜。”《大西洋》月刊登载赫德尔斯顿一篇题为《战后之世界病》的文章,将战后欧美社会的病状概括为7个方面:(1)人人皆寻求人工的娱乐,状如中狂,而尤喜觅不愉快的娱乐;(2)喜夸耀自炫,不务实际;(3)犯罪者日众;(4)好冒险投机;(5)残忍刻薄;(6)希望发财之心甚切;(7)不愿操正当之工作。文章慨叹道:这样的社会风气,使一切道德传统、宗教戒律,均不足以维系人心,此诚当世之大患!^[6]

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在上层思想界也强烈地表现出来。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大战期间完成的著作《西方的没落》在战后轰动一时。他认为:每一种形态的文化就象一株花、一棵树那样,都有其发生、成熟到衰落的“宿命”。他觉得,使用《西方的没落》这个书名,恰切地表达了全书的思想。斯宾格勒说:大多数文化都经历了一个生命的周期,西方文化也不例外。西方已经走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正通过反省物质享受而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7]。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罗素也承认:“欧洲文化的坏处,已经被欧洲大战显示得明明白白。”他认为西方近代文化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产业主义,这种制度虽然给人类带来许多物质上、科学上的进步,但是制度本身的缺陷,只能使其走上破坏的战争的道路。所以他的结论是:中国人要为自己的国家和世界人民谋幸福,决计不要“一味效法西方”^[8]。

二、西方文化危机引发中国思想界学习西方的观念转变

长期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将之看作仿效的榜样。他们密切注视着西方世界的动向,狂热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种种新学

说和新思潮。欧洲大战和战后危机无疑向中国知识分子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促使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们的思想观念因此经历着急剧的变动。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启蒙思潮发生了转变,呈现出以下几种趋向。

(一)对民主主义内涵理解的扩宽和加深,进而表示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的失望

民主本来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初期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高举民主的旗帜,其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可是到五四运动前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影响,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抗,更加暴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这时候如果还是一般地呼喊“德模克拉西”的口号,显然就有些苍白无力了。因为它不足以解释世界上发生的新变化,不足以号召群众起来同世界上的反动势力作斗争。所以需要把新的内容溶入其中,使它增添新的颜色,具有新的力量。谭鸣谦把“德模克拉西”分为政治的、经济的、精神的、社会的4个层面,指出社会的“德模克拉西”就是像俄、德那样进行反对军国主义、强权主义的革命。经济的“德模克拉西”与社会的“德模克拉西”中最大的问题是劳动问题,解决劳动问题最有价值的言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是号召劳动者起来革命的,所以,“《资本论》一书实为近代社会民主党所始终奉行之圭臬。”^[9]这时人们所理解的民主主义虽然是混杂的,但它纳入了超出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内容。这个进步是世界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影响的结果。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对民主观念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失望心理的增长。《东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说:议会“所代表者,非多数恃劳动为生之国民之意思与利益,惟少数地主资本家之意思与利益而已”,“近来政治道德之堕落日甚,选举票之买收,已成为公然之事实。”所谓“多数”,不过是金钱造出的“多数”,资本家造出的“多数”。正因为如此,西方社会反对议会政治的趋势逐年增大,特别是“大战以来,其势益强”^[10]。新民学会在讨论建设“湖南共和国”的方案时所表达的意向是对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失望心理的一个更好的例证。他们鲜明地提出:既不要中国式的共和国,也不要美国式的共和国。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式的共和国只可算是资本家、绅士、贵族的共和国。只有资本家、绅士、贵族享受幸福。至于平民

呢?劳动者呢?一样地受痛苦”^[11]。

(二)对生存竞争意识的淡漠和对互助意识的增强

19世纪下半叶,斯宾塞、尼采等人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原理引入社会历史领域,用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原则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的甚至公然美化侵略战争。19世纪末,随着严复翻译《天演论》等书,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思想意识在中国逐渐播散开来。起先,维新志士向国人介绍此说,无非是欲激发中国人民奋起救亡。可是到民国建立之后,其社会意义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存竞争、优胜劣汰成为一群军阀政客巧取豪夺、徇私作恶的理论根据。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惨重破坏引起世界舆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责难纷纷。从世界到中国的现实,都使人们对“生存竞争”的观念产生一种强烈的厌恶感。较早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明确主张互助主义的是《劳动》杂志上石子的文章。文中说:自19世纪达尔文学说大张以来,“‘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一语,遂为人假以行恶。政府以之扩张军备;野心家以之制作战争,资本家以之攫取金钱;……于是灭绝天理,惨绝人伦,杀人放火之事无所不为。”“故其流毒之所致,遂不胜数。此次惨无人理之欧洲大战”就是验证。文章认为:无限制的竞争,实际结果是“一面为进化,一面为堕落”。而互助主义则正相反,“惟有幸乐,而无苦难。”所以,文章明确主张“反对竞争之论,而思以互助主义代之”^[12]。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一书的某些观点开始畅行。可以说,在中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的心灵里,对竞争意识的淡漠,对互助意识的增强,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危机的魔影的反照下定型的。

(三)由相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迈向世界主义、大同主义

欧洲大战表面上是国家、民族之间的生死搏斗,而实际上不过是极少数操纵经济势力的资产阶级垄断集团之间的经济争斗。各国大多数人民受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观念的蒙蔽,在资产阶级政府的欺骗驱策下,葬身炮火,牺牲生命。大战结束后,国际进步舆论鉴于武力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亘古未有的大灾难,鉴于竭力鼓吹国家主义的德国的覆败,于是有识之士开始努力提倡国际主义或更进而主张世界主义。这股思潮也同样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大战后的时代应是由国家主义迈向国际主义、世界主义的过渡时代。在罗

罗译介的一篇论述德国社会革命的文章中,描述中欧人民视阶级战争的红旗“较国旗为尤亲切”。认为这种红旗之所以飞扬欧陆,正是因大战而引起的反响,它是“推翻国家主义,建造大同主义之先声”^[13]。有人提出:在中国应当提倡“文化的国家主义”,反对“武力的国家主义”。这样既可增高本国的地位,又不与各国的利害相冲突。它不但不会阻碍,相反可以“促成国际主义、世界主义之实现。保障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福利”^[14]。国际主义、世界主义不仅成为一般思想界趋同的认识和精神向往,甚至已渗入学术研究的指导意图。有人提出:从前的经济学不过是“做了个人主义、国家主义的牺牲,造出许多罪恶”。认为阶级战争就是个人主义经济学的产物,国际战争也是国家主义、利己主义经济学造出来的,这次大战不尽是军阀、政治家的罪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派经济学者“也不得不分任其咎”。所以,现在的经济学,指导思想要变换,“要谋人类的幸福”“以社会为目的”。只利一阶级,不利他阶级的经济学,“我们固然反对,就是利一国而不利他国的,也不能令人满意。”“仅着眼于一国的利益,这不是20世纪学者应采取的态度。”^[15]

(四) 提出根本变更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要求

较早提出变易制度观念的是《旅欧杂志》中一篇宣扬人道主义的文章。文章把现代西方文明社会看作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社会。如资本家以劳动者为牺牲品,强国以弱国为牺牲品,帝国主义以殖民地为牺牲品,“腹其脂,敲其骨,疲其筋力,室其生计。”文章认为:治本的办法,一要改变这种牺牲的制度,二要打消牺牲他人的观念,而代之以人道主义这一剂“救时之良药”^[16]。由罗译介的一篇论述李卜克纳西《论军备主义》一书的文章,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盛行的军备主义作了比较彻底的揭露。他指出:近代的军备,实际上都是为资本家而设的,“对外用以扩张领土,以遂其经济的侵略;对内则用以保持资本阶级之势力以压抑劳动。”资本主义与军备主义,二者“相助为虐”。如果不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军备主义也无法根除,而世界人类就永远不会有“平和幸福之望”^[17]。有的文章在分析西方物质文明发达而社会反呈悲惨之相的原因时,已得出了“物质文明进步之价值与私产制度殆成不可两立之势”的相当深刻的结论^[18]。总之,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是“现今社会生活之最大祸根”^[19]。1920年5月,《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出版纪念“五一”专号,其中响亮地喊出了“毁灭资本”的口号。

青年学生们谴责“资本是蹂躏人道的利器,是世界战争的导火线”,认为:“我们如果要达到世界和平、人道保障的目的,必先毁灭资本。”^[20]当时的知识分子强烈地意识到,社会主义是一股排山倒海而来的大潮流,无论什么阻力都不能阻止其发展。当然,由于中国落后的社会物质条件,使他们对于这种奔腾咆哮而来的新潮流,一下子不可能有真切的理解,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但他们从不同的立场、角度以极高的热情迎接它、介绍它、鼓吹它。不要私有,不要阶级,不要压迫剥削,分配要平均,人人要劳动等等带着社会主义色彩的观点、理想模式,一时间为进步知识界普遍赞同,津津乐道。谈论社会主义蔚然成风。

上述一系列观念的更新变化,充分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弊病已公开地、大规模地显露,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些反响的基本标志是:思想观念趋向于平民主义、互助进化、世界主义、财产公有,而集中辐辏于社会主义。这股新思潮当然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接受这股思潮的主体成分也很复杂,有爱国的民主主义者,有无政府主义者,有人道主义者,也有社会改良主义者。但是,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创造了条件。

三、宏阔的世界眼光与中国先进分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一) 五四前后中国先进分子的世界眼光

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他们具有宏阔的世界眼光。五四时期的先进人物更是这样,他们的世界意识更加突出,更加自觉。首先吹响新文化运动号角的《青年杂志》,以其非凡敏锐的洞察力向青年们指出:“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青年“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21]。陈独秀在《敬告青年》的著名文章中,对为什么要放眼以观世界作了更具体深入的阐释。他说:近代世界,海陆交通,日渐发达,朝夕千里,各国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密。一国的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动,“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他还说:在这万邦并立、动辄相关的世界上,各国的文物制度,形式虽不必尽同,但原则精神渐趋一致,这是不能违抗的潮流^[22]¹³³。这种跟随世界潮流前进的思想,有助于他后来跃出一般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的旧潮流,而跟上世界发展的新潮流。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著名人物李大钊,更是具有

世界眼光的先进代表。早在1915年4月,欧洲大战刚爆发不久,李大钊就明确指出战争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世界既沉于战乱之中,则凡立国于世者,当无不受其影响。中国与巴尔干,同为列强势力集中之点,此后存亡之命运,愈见逼紧。凡在国民,宁容漠视?”^{[23]129}1917年2月,他又告诫国人:“要知今日世界潮流,风飘云卷。以中国之大,人民之众,影响于世界商务、工业、经济、财政者不知凡几。”中国与世界有着如此重要的联系,要想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可能的。1919年9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号召20世纪的少年要“把眼光放的远些”“不要受狭隘爱国心的拘牵”。我们“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24]。

一方面有这些先驱者的倡导影响,一方面受世界风云的激荡,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先进青年,在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这个基点上,也已获得相同的认识和意向。毛泽东、蔡和森等创立的新民学会,1920年明确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把“认识世界,改造中国”确定为学会的方针,表示“倾向于世界主义”,“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自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他们说:“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25]1922年,周恩来在论证马克思主义同样适应中国国情时,更明确地指出:“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26]

以上表明,五四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一般都具有世界的眼光。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局限于哪一国,也不局限于革命潮流这一方面。他们是把世界当作一个联系的整体看待。既然是这样,那么,当考察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会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应当一方面弄清当时世界客观的全面的形势,另一方面沿着接受者的思路和心理状态,去探寻他们接受时的真正推动力。由此,也就会发现:正是西方文化危机催促他们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或至少是促成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五四前后中国先进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1917年3月底4月初,李大钊发表了《战争与人口问题》和《战争与人口》2篇重要论文,在这2篇文章中,他深感欧洲大战给近代西方文化蒙上的一层可怕的阴影。他认为:欧洲大战的发生,不仅有物

质上、经济上的原因,社会达尔文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等思想学说也难辞其咎。为此,他喊出了“创造新文明,改建新国家,俾存立于世界,与西洋之文明之民族相对立”^{[23]449}的呼声。可以说,这种模糊的“创造新文明”的愿望就是他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第一个信号。很明显,在十月革命的炮声还未鸣放之前,西方文化危机的事实就已促使李大钊这样的先进分子在学习西方的航程中萌发出了新的取向,迫使他不得不去寻找能为人类带来真正和平幸福的新文明。这是李大钊后来欢呼赞颂十月革命,进而如饥似渴地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上的重要基石。众所周知,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是他思想上出现新的飞跃的重要标志。也在这一时间,他还发表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这篇文章清楚地回答了他为什么欢呼十月革命的思想根源。他说:西洋文明,现在正有“趋于自杀之倾向”。“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所以从今天的情势看来,“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而俄罗斯文明正好“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23]204}。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略晚于李大钊,他对欧洲文化危机的认识远不如李大钊那么敏锐。然而冷酷严峻的事实终究使他日益清醒。五四前后,他亦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行为和军国主义表示强烈的义愤,对美、英、法等国鼓吹的所谓“公理”感到失望,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表示同情和理解。这时他察觉到:“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已经大大的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22]515}十月革命的影响加上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和帮助,到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的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在陈独秀的《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这2篇马克思主义代表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方文化危机在他的思想中占着何等重要的位置。当他谈到“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时,首先便提出,要“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底危机”,然后才能讲清这个问题。可见,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已成为他立论的重要支柱。

五四时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队伍中,还有一些更年轻的知识分子,如周恩来、蔡和森等。他们迫切希望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和中国。在

出国之后,他们对于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残破动荡状态的观察,无论其广度或深度,在当时中国的先进青年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这种观察对他们迅速转变为明确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比如周恩来向国内发回的头一篇通讯的标题就叫《欧战后之欧洲危机》。接着他又撰写了《英国经济现象之恐慌》《英国矿工罢工风潮》等文章。这一系列报道不仅使国内人民了解欧洲的危机,也同时记录着作者心灵中对危机的种种感受。周恩来说:“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他历述了战后西方生产力的缺乏、经济界的恐慌、人民生活的困窘及战争对精神文明的破坏等种种现象。稍后,当他日益向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转变时,便明确地指出:要使“今日世界的经济乱象,阶级对抗情势,文化颓机不再长久下去”,只有使“人类全无产化”。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灭

绝这个最大的乱源”^[27]。我们从这些斩钉截铁的结论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欧洲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给周恩来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正是这些因素推动着他的思想一步步向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前进。

四、结论

中国先进分子在五四前后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偶然现象,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历史统一;不是个别人的思想创新,而是在世界文化变动,也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变动催迫下引起的反响。马克思主义能传入中国,并且很快就落地扎根,与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正确地认识到中国是世界整体中的一部分这一点大有关系。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他们才能把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前途联系起来,并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 罗罗. 一千万之战死者[J]. 东方杂志, 1919, 16(4): 59.
- [2] 蔡和森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126.
- [3] 梁启超. 欧游心影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76-79.
- [4] 昔尘. 英国劳动争议之真相[J]. 东方杂志, 1920, 17(7): 14.
- [5] 马鹿. 佛朗西访问记[J]. 东方杂志, 1921, 18(1): 97.
- [6] 赫德尔斯顿. 战后之世界病[J]. 东方杂志, 1920, 17(14): 37.
- [7]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M]. 齐世荣, 田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229.
- [8] 罗素. 中国人到自由之路[J]. 东方杂志, 1921, 18(13): 122.
- [9] 谭鸣谦. 德模克拉西之四面观[J]. 新潮, 1919, 1(5): 28.
- [10] 昔尘. 议会政治之失望[J]. 东方杂志, 1920, 17(17): 19.
- [11] 新民学会资料[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237.
- [12] 石子(刘石心). 动植物间之互助生活[J]. 劳动, 1918, 1(1): 12.
- [13] 罗罗. 德国社会革命与斯巴达克斯团[J]. 东方杂志, 1919, 16(4): 25.
- [14] 君实. 文化的国家主义[J]. 东方杂志, 1920, 17(16): 5.
- [15] 佚名. 经济学者之责任[J]. 东方杂志, 1920, 17(2): 107.
- [16] 精卫. 牺牲之意义[J]. 东方杂志, 1917, 14(1): 24.
- [17] 罗罗. 今日之马丁路德[J]. 东方杂志, 15(4): 66.
- [18] 陈达材. 物质文明[J]. 新潮, 1919, 1(3): 37.
- [19] 李四杰. 论近世经济学说之趋势及中国所有权制度之宜改良[J]. 东方杂志, 16(6): 207.
- [20] 芳雨. 我们劳动者在中国内的要求[J].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 1920, 5(14): 6.
- [21] 社告[J]. 青年杂志, 1915, 1(1): 2.
- [22] 陈独秀著作选: 第1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133.
- [23] 李大钊文集: 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129.
- [24] 李大钊文集: 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45.
- [25] 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83.
- [26] 周恩来. 共产主义与中国[J]. 少年, 1922(2): 17.
- [27]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 第3册[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1: 314-320.

Bound of Justice and Responsibility: on David Miller's View of Global Justice

WANG Jie¹, LIN Mei-qing¹, LIU Ming-ming²

(1. College of Marxism,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Shandong,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4, China)

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21th century, the problem of justice, especially the global justice, is becoming a hot spot of study abroad, the famous representative of market socialism, David miller, also turned to the study of global justice. Miller's theories of global justice included: firstly, the global justice was not equal to global egalitarianism, it maintained the national political independence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 world; Secondly, each nation's consequent responsibility and inherited responsibility were indispensable for global justice, which required that each nation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past and present actions; Thirdly, global justice was not exclusive to national remedial responsibility, which regarded basic human rights as a baseline. Analyzing and grasping Miller's global justice ha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global justice;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basic human rights

(责任编辑 李世红)

(上接第 53 页)

Western Cultural Crisis and the Choice of Chinese Advanced People to Marxism

DING Yun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crisis in Europe caused a serious crisis of Chinese advanced people to western culture, and prompted them, who have the broad world vision, to conduct their profound reflection of Western capitalist culture. In this process, their ideas experienced the rapid change, from advocating capitalistic democracy, nationalism, competition, private property to populism, mutual aid evolution, cosmopolitanism, public property, and focused on the socialist convergence. From the view of world history, with a unitary perspective, the choice of Chinese advanced people to Marxism was a response caused by the world culture changes.

Key words: western cultural crisis; first world war; Marxism; Chinese advanced people; choice

(责任编辑 李世红)